



石地著

古代商战攻略

中国古代战术博大精深,神奇多变,不仅实战性很强,而且对当今商战也颇有借鉴意义。先胜求战孙子兵法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 Ltd.

古代商战攻略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战术博大精深,神奇多变,不仅实战性很强,而且对当今商战也颇有借鉴意义。先胜求战孙子兵法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意思是胜利的军队先有胜利的把握,而后才寻求同敌人交战。这是高瞻远瞩、积极谨慎的用兵谋略。在商战中,运用先胜求战的战略,就是要审时度势,在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情况下,再决胜于市场。本书呈现了那些精彩的商战故事。

ISBN 978-7-89900-349-7

出版时间: 2015 年 12 月

总 策 划: 祁兰柱

责任编辑: 阮琳越

封面设计: 刘艳红

出版发行: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甲 55 号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大楼一层北侧

邮 编: 100010

Website: www.dajianet.com

E-mail : kf@mail.wpcsh.com

电 话: 010-58110486

传 真: 010-58110456

版 次: 2015 年 12 月 第 1 版

字 数: 76000

定 价: 2 元

ISBN 978-7-89900-349-7



目 录

第一章 安民可行义，危民易为非

陆贾奇谋定汉室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

齐桓公任相

腹~~黄~~杀子

得其民，得天下

兵不可不察

明君慎战

吴起谏魏文侯

刚柔相济

治国治军

孙臆见齐威王

以仁为本

严刑峻法诸葛亮治蜀

魏武帝铲灭佛教

隋文帝修订律令

唐太宗论文武之道

唐宪宗减免赋税

齐威王考察政绩

皇太极定国策

言行统一利于国

得人心者得天下

有备而无患

治国治军之五害

太子李贤对官多兵少的忧虑

敬天敬地敬业

君臣之间各名本份

多听多看

治国之道的先与后

第二章 国有七患足以亡国

治国患社鼠

事强暴之难

卫嗣君以城换回奴仆

主令不从则国危矣

仁义是治国之根本

先理纲后理纪

智者为政则治

王者官人有六等

治国必先齐其家

明主好要暗主好详

以德兼人者王

蓄积以防灾
君王须解决三大问题
治国应先利于民
治国应以民为本
国家不乱，根本在民
勤俭治国

第三章 敬士爱民
齐桓公微服察
民富才能国强
贾诩事曹
诸葛恪治山民
陆贽怀柔之策
妥善处置李继迁之母
萧规曹随
诸葛亮删繁就简
强国之道
地均方能富国
强兵足食以卫国
治国的根本
避免奢侈之风
居满思缺
穷极思变
节约是治国之本
控制人口是立国之本
贫穷生邪恶
合理利用财富
学校，教育之根本
重教即兴国
从教之鉴
民族振兴教育先行
师之不尊教育必废

第四章 殷纣失国的教训
为政须防吹捧者
物产乃治之本
储蓄粮食有备无患
并官简政务农为本
善治莫若省官
仓廩实则知礼节
生产发展与商业繁荣
为政要惜民
屈一人而乐天下
民足则国泰

不失时
割股以啖腹
守成更难
清静无欲
顺民心者昌
民为贵
与民共享才是国之宝
功不在于吹捧

第五章 法之受阻在于官

君正臣顺
了解下情则国治
聋哑不能治国
审时度势
法治不可急于求成
控名责实则治
赏罚公正
令行禁止，治国之关键
子产遗言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不要四面出击
维护人民政权之法
开展“五反”斗争
认清敌友之法
调动两个积极性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勤俭建国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反对大汉族主义
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第六章 汉昭帝明辨识真假

韩延寿教化百姓
李斯献言助国兴邦
管仲未用兵卒平鄆国
陶侃收集木屑、竹头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子产不毁乡校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两国会盟文武相随
洪秀全失策丧天国
皇太极劝降洪承畴

第一章 安民可行义，危民易为非

【原文】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天下虽有道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于刑戮者，正倾非也。此二世之过也。

（《过秦论》中篇）

【译文大意】所以治民的方略，关键在于使人民安定，如果人民安定，天下虽然有叛逆之臣，也必然没有群起响应之众。所以说：安定的人民可以实行仁义，而危难中的民众却容易为非做歹。正是指的这个。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被刑戮的，象秦始皇死时，秦帝国正如即将倾覆的大厦，秦二世未采取矫正的方策，故身死国亡。这是秦二世的过错。

【阐释】使人民安居乐业是治国之本。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都是被人民起义推翻的，而激起民变的原因，都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过份暴虐。一旦民众揭竿而起，即使是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的皇帝，也不免被刑戮的下场。

陆贾奇谋定汉室

【原文】吕太后时，王诸吕，诸吕擅权，欲劫少主，危刘氏。右丞相陈平患之，力不能争，恐祸及己，常燕居深念。陆生往请，宜入坐，而陈平方深念，不时见陆生。陆生曰：“何念之深也？”陈平曰：“生揣我何念？”陆生曰：“足下位为上相，食三万户侯，可谓极富贵无欲矣。然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陈平曰：“然，为之奈何？”陆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调和，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臣尝欲谓太尉绛侯，绛侯与我戏，易吾言。君何不交欢太尉，深相结？”为陈平画吕后数事。陈平用其计，乃以五百一金为绛侯寿，厚具乐饮，太尉亦报如之。此两人深相结，则吕氏谋益衰。

（《汉书·陆贾列传》）

【译文大意】吕太后的时候，封许多姓吕的为王，吕氏诸王专权，想强夺汉少主之权，危及到刘氏天下。右丞相陈平很忧虑，势单力孤不能抗争，恐怕会祸及自己，常常静居深思。陆贾前去问候陈平，直接进屋坐了下来。而陈平此时正在深思，没有及时发现陆贾。陆贾说：“为什么事沉思？”陈平说：“你猜我在想什么？”陆贾说：“你位为上相，是食封三万户的侯，真可谓富贵到了极点，再没有什么可想的了。然而你有忧虑，不过是忧虑吕氏诸王和汉少主罢了。”陈平说：“对呀，你说怎么办？”陆贾说：“天下安定的时候，丞相的作用大；天下危难的时候，将帅的作用大。丞相和将帅的关系协调，则士必然归附；如果士必然归附，天下虽然有变动，则权力不分散。安定国家的计谋，就在你们二位：位的掌握之中。我尝想劝太尉绛侯，可太尉不和我认真，轻视我说的话。你为什么不和太尉结交呢？”随后为陈平谋划了打击吕后的几个步骤。陈平用陆贾的计谋，用五百金为绛侯祝寿，准备了丰盛的音乐、酒宴，太尉也以同样的方式回报了陈平。从此两人联合，而吕氏的计谋越来越不能得逞。

【阐释】团结就是力量。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只要联合起来，世界上就没有干不成的事业。陆贾之计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促成“将相和”，以达到安定天下的目的。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

【原文】陆生时时前说称《诗》入《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习《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

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怩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占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

（《史记·陆贾列传》）

【译文大意】陆贾常常在汉高祖前赞《诗》，《书》，汉高祖骂他说：“你老子我居马上得天下，为什么学《诗》，《书》？”陆贾说：“在马上得天下，难道可以在马上治天下吗？商汤用武力取得天下，用文治治理天下，文武并用，这才是长久之策。昔门吴王夫差、智伯都是因为黷武而失败；秦任刑法不变，终于灭掉了赵氏。如果秦朝合并天下以后，能推行仁义，学习先朝圣人，陛下能得天下？”汉高祖面带惭愧，对陆贾说：“你试着为我写秦朝之所以失去天下，我之所以得到天下的原因，及上古国家成败的教训。”陆贾于是大致叙述了国家存亡兴衰的教训，共著文十二篇。

【阐释】武力可得天下，但并不能治理天下。穷兵黷武的吴王夫差所以难免：失败；一味推行暴政的秦二世也注定速亡。所以，古人说：“过份刚强的东西容易折断”就是这个道理。

齐桓公任相

【原文】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病矣，渍甚，国人弗讳，寡人将谁属国？”管仲对曰：“昔者臣尽力竭智，犹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于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愿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诺，曰：“公谁欲相？”公曰：“鲍叔牙可乎？”管仲对曰：“不可。夷吾善鲍叔牙。鲍叔牙之为人也：清廉洁直，视不己若者，不比于人；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一勿已，则隰朋其可乎？隰朋之为人也：上志而下求，丑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其于国也，有不闻也；其于物也，有不知也；其于人也，有不见也。勿已乎，则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处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斗，大兵不寇。”桓公行公去私恶，用管子而为五伯长；行私阿所爱，用竖刀而虫出于户。

（《吕氏春秋·贵公》）

【译文大意】管仲得了病，齐桓公前往看望说：“仲父的病很重，这种时候所有的人都是不讳言生死的，你死之后由谁来当相国呢？”管仲回答说：“以前我竭尽心智，尚且不能确切知道谁能任国相，现在病得朝不保夕，我怎么能说呢？”齐桓公说：“这是国家的大事，愿仲父能告诉我。”管仲恭敬地答应了，说：“您准备任谁为相？”齐桓公说：“任鲍叔牙为相可以吗？”管仲回答说：“不可以。我和鲍叔牙很相知。鲍叔牙的为人：清正廉洁，看到不如自己的人，就不和他亲近；一听到别。人的过失，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不得已，隰朋可以吗？”桓公说。管仲说：“隰朋的为人：能羡慕上世贤人而又不耻下问，自愧不如黄帝，而又怜悯不如自己的人；他对于国事，有些不必过问的就不问；他对于事物：不必知道的就不去了解；他对于人，很宽厚，有时对别人的过错都装着没看见。隰朋可以任为国相。”国相，是很大的官。凡做大官的，不在小处苛求，也不看他是否有小聪明。所以说：“大匠只规划示范，不自己动手砍削；大厨师只调和五味，不自己动手宰割；真正的武士气势凌人，而不用亲自搏战；正义之师从不侵害别人。”齐桓公秉公义去私恶，任用管仲而齐国为五霸之首；而他偏私所爱，任用竖刀使他死后无人收尸。

【阐释】举贤任能是国家兴衰存亡的关键，历史反复证明，任一贤者则国家安宁，任一小人而国家动乱。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而使他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造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管仲死后他任用亲信竖刀，使他活活饿死，而且死后无人主丧，尸虫都流出了门外。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多么深刻的教训。

腹黄杀子

【原文】墨者有钜子腹黄，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黄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黄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子，人之所私也，忍其所私以行大义，钜子可谓公矣。

（《吕氏春秋·去私》）

【译文大意】有一个在墨子学派中有成就的人叫腹黄，居住在秦国，他的儿子犯罪杀了人。秦惠王对腹黄说：“先生年纪大了，又没有其他儿子，我已经下令官吏不要杀您的儿子，先生你就听从我的安排好啦。”腹黄：“墨子学派的法律规定：‘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处刑。’这是为了禁止杀人和伤人。而且禁止杀人、伤人是天下大义所在，大王虽然恩赐我，不让官吏杀我儿子，但我却不可不行墨家法规。”腹黄没有接受秦惠王的恩赐，并且敦促官吏杀了自己的儿子；亲生子女是人之所爱的人，忍心对待他所爱的儿子推行共义，腹黄可以说是大公无私了。

【阐释】私心杂念人人有之，尤其在关系到个人切身利益的问题上，能去私心存共义确实是令人敬仰的品德。腹黄含泪杀子，诛暴无私，受到千古人的仰慕。

得其民，得天下

【原文】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理：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心矣；德其心有道：所欲与人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圯也。故为渊驱鱼者，獮也；为丛驱爵者，朗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

（《孟子·离娄上》）

【译文大意】孟子说：“夏桀和商纣的丧失天下，是因为失去了百姓；他们失去百姓，就失去民心，要获得天下的好办法是：赢得百姓。便能赢得天下；要赢得百姓的好办法是：得到民心，也就是能得到百姓；要得到民心的好办法是：百姓所盼望的就给他们满足，所讨厌的就不强加给他们，这样子就行了。百姓归附仁德，就好比水向低处流，野兽向旷野跑一样自然。因此，替深池把鱼驱赶来的是水獮；替丛林把鸟雀驱赶来的是鸢鹰；替商汤、武王把百姓驱赶来的是夏桀和商纣。今天，天下的君主如果有好仁的人，那么别的诸侯就会替他驱赶来百姓，到那时即使不想统一天下，也会身不由己。

【阐释】越王蒙受会稽之耻以后，他知道，雪耻的唯一希望就在百姓身上，所以对内亲抚群臣，对外教养百姓，与民同甘共苦，终于赢得了人民对他的信赖，这才起兵灭吴，在五湖大败吴军。这一事例也在证明着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

兵不可不察

【原文】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兵法·上卷·计篇》）

【译文大意】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国民的生死，土地及财产的护卫和国家的存亡，是不能不予以认真研究和慎重考虑的。

【阐释】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雄，征战不已，王公贵族往往把战争的胜负寄托于神灵，

每战必祀。而孙子则首先提出，战争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在祈求神灵之前，必须先要对战争各要素进行系统考察，把握战争的规律，计算优劣，推断胜负。方可兴师动众。即所谓，计先定于内，而后兵出于外，用兵之道，始于计谋。

其实，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虽不至直接关系生死，但在事业上的发达和人事关系的成功上也有似“存亡之道”，而“不可不察也”。我们也要事事先有计划，不能兴之所至，杂乱无章，或虽有计划，但或不切实际，无法实行，或有始无终，一事无成。

因此，认真研究和慎重考虑是很重要的。

明君慎战

【原文】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已，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孙子兵法·下卷·火攻篇》)

吴起谏魏文侯

【原文】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

文侯曰：“寡人不好军旅之事。”

起曰：“臣以见占隐，以往察来，主君何言与心违？今君四时使斩离皮革，掩以朱漆，画以丹青，烁以犀象。冬日衣之则不温，夏日衣则不凉。为长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车庵户，幔轮笼毂，观之于目则不丽，乘之以田则不轻，不识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备进战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犹伏鸡之搏狸、乳犬之犯虎，虽有斗心，随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故当敌而不进，无逮于义矣；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

于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觞，醺吴起于庙，立为大将，守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吴子·图国》)

刚柔相济

【原文】《军谡》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

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故能图制无疆，扶成天威，匡正八极，密定九夷。如此谋者，为帝王师。

故曰，莫不贪强，鲜能守微，若能守微，及保其生。圣人存之，动应事机，舒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怀，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敌国服。

《军谡》曰：“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消。纯刚纯强，其国必亡。”

(《黄石公三略·上略》)

【译文大意】《军谡》上说：“柔能够制服刚，弱能够战胜强。”“柔”而适中是美德，“刚”而失中是祸患，“弱”而有德会得到人们的同情和帮助，“强”而不仁会受到人们的怨恨和攻击。有时需要设置“柔”，有时需要施行“刚”，有时需要使用“弱”，有时需要施以“强”。

这四个方面要互相兼顾，根据具体情况的发展变化，而适宜地巧妙运用。

事物的真象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人们就不能认识它。大自然的奥妙，要依靠事物的逐步变化来了解。奇正的运用变化无常，是因为敌情变化多端。不要敌情不明就预先死板地定框子，而要根据敌人的变化而随机应变。这样就能谋取控制天下，帮助君主成就功业，树立威权，拯救极远的边民，安定东方的“九夷”。能有这样谋略的人，可以做帝王的老师。

古语说，人没有不逞强好胜的，却很少能持守刚强柔弱的微妙。如果能掌握它们的微妙，就能保全生灵。“圣人”把它存在心里，行动起来就能适时地应付各种事变，放开它会充满天下，收起它却不满怀抱，安置它不用房屋，保卫它不用城郭，把它藏在胸中巧妙运用，就能使敌国屈服。

《军谶》上说：“能用柔又善用刚，国家就充满光明。既能用弱又善用强，国家就愈加昌盛。纯粹用柔单纯用弱，国家一定削弱。纯粹用刚单纯用强，国家必定灭亡。”

【阐释】“柔能制刚，弱能制强”。这原是老子的思想。“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人无间。”（《老子》第四十三章）“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第七十六章）。正确把握“柔弱刚强”的关系，在治国用兵上是至关重要的。在“柔弱刚强”上，这里更强调“贵柔”、“贵弱”的观点。它认为：柔而适中是美德，有德刚人愿归附。刚愎不仁就会失掉人心。同时“柔、弱、刚、强”各有所宜、各有所用。要“兼此四者而制其宜。”这是说要根据“柔弱刚强”的各自特点，恰当适用。当柔则柔、当刚则刚；可强则强、可弱则弱。为了在战略战术上骄敌、纵敌、诱敌，最后达到制敌、克敌的目的，就要灵活地运用“柔弱刚强”。战术上孙臆指挥的马陵之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孙臆在强大的魏军面前，以己之柔示弱，助长庞涓的骄气，使他误入齐军设伏的马陵道，接着孙臆再一声令下，齐军万弩齐放，以势如破竹的强大攻势，击败魏军，迫使庞涓自杀。诸葛亮的空城计，也是以柔制刚的一个光辉典范。在敌方强大的攻势下，诸葛亮不动声色，轻琴慢弹，不费一箭一镞，不伤一兵一帅，用一人智慧胜敌万千军马。以柔制刚、以弱胜强，保全了自己的力量。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重柔一重弱”在战略战术上是十分重要的。“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这里以国家的兴衰存亡来证明“柔弱刚强”的辩证关系，很有说服力，也进一步申明它的理论是为治国统军的战略服务的。遵循这个理论，国家就能兴旺昌盛，违背这个理论，国家就会削弱灭亡。

治国治军

【原文】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士庶之义，必奉于父母而正于君长。故虽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贵贱之伦经，使不相陵；德义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

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故德义不相踰。上贵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则无求。无求则不争。国中之听，必得其情，军旅之听，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从命为士上赏，犯命为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

既致教其民，然后谨选而使之，事极修则百官给矣，教极省则民兴良矣，习贯成则民体俗矣，教化之至也。

师多务威则民诟，少威则民不胜。上使民不得其义，百姓不得其叙，技用不得其利，牛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谓多威。多威则民诟。上不尊德而任诈僞，不遵道而任勇力，不贵用命而贵犯命，不贵善行而贵暴行，陵之有司，此谓少威，少威则民不胜。军旅以舒为主，舒则民力足。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逾列，是以不乱。军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绝人马之力，迟速不过诫命。

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故在国言文

而浯温。在朝恭以逊，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问不言，难进易退。在军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车不式，城上不趋，危事不齿。故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

古者贤王明民之德，尽民之善，故无废德，无简民。赏无所生，罚无所试。有虞氏不赏不伐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赏而不罚，至教也。殷罚而不赏，至威也。周以赏罚，德衰也。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速覩为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赏，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则不骄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让之至也。大败不诛，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过，下苟以不善在己，必远其罪，上下分恶若此，让之至也。

古者戍兵三年不典，睹民之劳也。上下相报若此，知之至也。得意则凯歌，示喜也。伯灵台，答民之劳，示修也。

(《司马法·卷上》)

【译文大意】天子应奉天地之道，调合阴阳四时之气，顺应潮流，参酌先圣之法度，去争取民生乐利。士民们应从父母之教和君长之命，而为国家尽其义务。上下各尽天职还不够，还得教民能保国卫民。否则，即使有了贤明的君主，不先教会百姓保国保家，就不能依靠民众消除内乱抵御外患。

古代教民保国卫民，必须先立职位，使上下有序，各守分寸不相侵袭；分清什么是有得于心的德，什么是行为得其当的义，使能区别不相超越，认得谁是贤能的通才，谁只是专门技术人才，使能各展所长不相掩盖；知道谁处事勇敢果决，谁只是一个力士，使各种人才各尽所能不相冒犯。若能如此，就意志集中，力量一致了。

古代教民方法，治国以仁德，治军以勇德，不用治国方法治军，也不用治军方法治国，所以不会使之过刚或过柔。为上级的，要重视那些不自夸有功能的人，因为不自夸的人方是上等人才。假如他不自夸便不会有贪求，不贪求便和人无所争执。在国内听断事务必得百姓的实情。在军旅听断事务必能得到正当的处置，所以通才偏才都不会被埋没。服从命令列为军人的上等奖。赏，干犯违背命令列为军人的上等奖，所以勇士力士都会守纪律了。

已经尽心竭力地教化民众，然后再谨慎地选拔、谨慎地使用他们。军用各事，要极周到地由主管官整备。教育各项，要极简明地使受教育者有学习兴趣。制度已成习惯，要使民众很自然地当作时兴风俗，这样的教化算最好了。

军队过分重视威严，百姓则受不了，然忽视威严，百姓便又会看轻了军队，不服于制。在上位之人，使用百姓不得当，百姓之间无次第之分，那么有技能才用的人便得不到施展其长处机会，牛马也使不上力量。官吏随意欺凌于民，百姓就会委曲难伸。在上位之人不尊重敦品励行的人，而信任奸诈邪恶的人；不尊重有智谋道法的人，而信任勇猛有力气的人；不上赏服从命令的人，而重视犯上抗命的人；不称赞救人救世的善良行为，而称赞残害别人的暴虐行为，如果这样地亵渎主管官的职权，就使得军队无威严，在百姓中没有威信。军队以宽舒平稳沉着为主要要求，只有以不过刚不过柔的沉着，才能充分发挥民力。即使在战场与敌交刃之时，也要步不急进，车不轻发，追击不超越战阵排列，沉着而不紊乱。以上所述，是使军队上下巩固的方法，着重在于有节制地确实掌握住成行成列的基本教练，不竭尽人马之力，于战场上进退迟速都不违背军队的训戒命令。

古代，不用治国的方法去治军，也不用治军的方法来治国。如果用治军的方法治国，那百姓的民权就会被剥夺，如果用治国的方法治军，那百姓的民权仍然会没有保障。所以，作为国家，立意要文明华美，言谈要文雅，措词要温和。在计议政事的朝堂上，为君王者要恭敬每个人的职位。态度谦和，修身以待人，自己所不愿做的事，不要强加到别人身上。为臣者要做到不受诏令不擅至君前，君不问不敢妄言国政，三揖而后进，一辞而即退，不为个人求前程发展。军中之士，则不讲求温文恭逊，说话对答高抗而直言，并站立不求礼节。作战时，行列之上要做到行事彻底，断事果决，着盔甲见尊者不需跪拜，乘兵车者不需抚车轼以

示礼，在城上警戒者不急奔而恐吓百姓，遇危事不启齿而惑众。所以尚礼、尚法，乃是治国治军的两个不同方面，二者互为表里；文教，武力，则是保国，卫民的左右两手。

古代贤明的国君，宣扬百姓好的道德，尽量去做百姓们所喜爱的人和事，所以百姓们就没有享不到的福利，没有遭疏忽的意愿，奖赏事迹也就无由发生，惩罚手段也就无所试用了。虞舜为帝王的时代，不赏不罚，而百姓却乐为其用，那是最盛大的功德感召所致。夏代只行赏而不行罚小是最良好的教导化育功能。商代只罚而不赏，是最严格的威风逼迫。周代赏罚并用，是因为功德感召百姓的力量已很衰微了。行赏及时，可使士卒百姓速得为善的好处，行罚当场，可使士卒百姓速睹为恶的害处。如果大捷胜利不行赏，不归功于个别人员，那么上下都不会争夸自己的功劳。在上位者不争功不自夸，就不会骄纵放肆；在下位者不自夸，则无隔阂无等级之分。上下都不自矜夸争功，就可称是极好的谦让风气。战争大败不行杀戮以为罚，不委罪于个别成员，那么上下都会认为自己有罪过。在上位者若认为自己有罪过，必定悔改向善，在几位者如认为自己有罪过，必定远离罪恶。上下都这样分担大败的责任，也可称作是谦让的最高程度。

古代派遣戍卫边疆的兵，前三年不用查兵籍册，每年有人自觉更代。为国君者要亲眼看到和体会到士卒百姓的辛劳。百姓士卒为国而服劳役，国君了解百姓的艰辛，上下之间相互报施，才会有最牢的团结。战争胜利便凯旋归国，表示快慰振奋，回国后偃武修文，筑高台使国君登其上而答慰百姓的辛劳，并宣布应开始休养生息了。

【阐释】本文就治国治军两方面展开论述，既谈出了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又谈出了各自的特点。“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这是说在治国治军的方法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不能用治国的方法去治理军队，也不能用治军的方法去治理国家。

治国要以礼为重，统治民众的关键在于教化上，民众只有进行教化之后方可使用。教化要使各级之间不相侵犯；有德行节义者以正道白守；有才能者各得以献艺，有勇气者不得逞强。百姓在教化之后才能够尽其义务，保家卫国。国内尚礼，除了以礼为重，注意教化百姓外，还反映在日常的一些礼节仪式上。它要求做到“在国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问不言，难进易退。”这是说治国时要讲文明，人与人之间要谦恭，君主要注意自身修养，尊重别人；臣民要不受诏令不上前，君不问不多言。显然，这里强调的是“礼”，国内尚礼，人们才能各就其位，各尽其责。

治军要严明赏罚，赏罚是维护军队纪律的一种手段。“从命为上赏，犯命为上戮。”军队必须赏罚严明，才能维护铁的纪律，保证命令的贯彻、执行。当年孙武杀了君王的宠妃，使宫女们明白了自己行为的准则，军队大振，成了一支有坚强战斗力的队伍。值得一提的是，文中还提到“大捷不赏”、“大败不沫”，意思是说，大胜时不赏，人人都不骄傲自满，就不会形成高低之分；大败时不罚，人人都检查自己的过错，吸取教训，应该说这是司马穰苴推崇的一种领导艺术，并不是和赏罚严明的观点相对立的。军队尚法不尚礼，违反军纪军令的事绝对不能做，但是平时它不讲究繁缛的礼节，要求将士言谈行为直言果决；戴盔甲的人见尊者不用跪拜；乘战车的人也不需行礼。

由此可见，本文阐述治国、治军的根本区别在于，治国尚礼，而治军尚法。

孙臆见齐威王

【原文】孙子见威王，曰：“夫兵者，非士恒势也。此先王之传道也。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事备而后动。故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夫守而无委，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尧有天下之时，黜王命而弗

行者七，夷有二，中国四，……素佚而致利也。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昔者，神农战斧遂；黄帝战涸禄；尧伐共工；舜伐蚩尤而并三苗，……管；汤放桀；武王伐纣；商奄反，故周公伐之。故曰，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曰我将欲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此尧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举兵绳之。”

（《孙臆兵法》）

【译文大意】孙臆晋见齐威王，对威王说：“军事上不能倚赖某种固定不变的形势。这是先代帝王传布下来的道理。打了胜仗，就能保存处于危亡中的国家，延续将被毁灭的世系。打了败仗，就会丧失领土而危害国家。因此，对战争问题不能不认真研究。轻率好战的人会导致亡国，一味贪求胜利的人会受到挫辱。战争不是可以轻率进行的，胜利不是可以随意贪求的。要先做好准备，而后才能采取行动。城小而防守坚固，是因为有充足的物资储备；兵少而战斗力很强，是因为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防守而无物资储备，进行战争而非正义，天下谁也无法使其防守坚固，战斗力强大。唐尧开始治理天下的时候，拒不执行其命令的有七个部落。东方地区有二个，中原地区有四个，……不能无所作为而获得胜利。只有用武力战胜敌人，才能使自己强大巩固起来，实现国家的统一。古时候神农战胜补遂；黄帝战胜蚩尤于涸鹿；唐尧讨伐共工；虞舜讨伐蚩尤而驱逐三苗，……；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讨伐殷纣王；商奄叛乱，周公率兵去镇压。所以说，那些功德不如五帝，才能不如三王，智略不如周公的人，却说什么我要以积累仁义、推崇礼乐、不用武力的办法来禁止战争。这种办法尧舜不是不想用，而是根本办不到，所以才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

【阐释】从文章的语言上看，本文是孙臆自记传与弟子的。它是孙臆晋见齐威王时，所陈述的对战争的一些看法，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孙臆的战争观点。文章的开始明确地指出：战争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存亡。“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故兵者不可不察。”这里孙臆不是简单地重复孙武的话，而是针对当时齐国的现实，向威王重申这一战争观点，以引起他的重视。齐威王即位时，齐国正处于低谷，出现“诸侯并伐”的局面，孙臆就是根据这一局面，向威王提出“战胜而强立”的观点，这是孙臆战争观中的一个灵魂，也是他对《孙子兵法》战争观的继承和发展。

同时，孙臆向威王指明了“战胜而强立”的条件，这就是“事备而后动”。孙臆告诫齐威王：“乐兵者亡”，“利胜者辱”。虽然说“战胜而强立”，但战争绝不是随便可以打的，不能随心所欲，穷兵黩武。当年智伯无缘无故用武力威胁赵、魏、韩三家，引来的灭顶之灾，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另外孙臆强调“事备而后动”，只有做好准备，才能“战胜”。这里孙臆提出两项准备是必不可少的。其一“有委”，这是指要有充足的物资储备，只有具备强大巩固的经济基础，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进行。其二，“有义”，这是指要有正义的理由，只有正义的战争才会取得民众和士兵的支持，而只有得到民众的支持，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孙臆在这里强调了战争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他把经济看成是进行战争的根本条件，而把政治看成是战斗力的首要因素，他认为这两者是“战胜而强立”的基本条件。

最后孙臆列举了七个古代战争的事例，向威王阐明“战胜而强立”的目的。只有“战胜而强立”，才能消除分裂，平息叛乱，最终目的是达到天下统一。从这里可以看出孙臆不是一个好战分子，他并不是无条件地赞成一切战争，而是赞成统一的、进步的、正义的战争。

此文是《孙臆兵法》中极为重要的一篇，“战胜而强立”这一观点，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对后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以仁为本

【原文】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故仁见亲，

义见说，智见恃，勇见身，信见信。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

战道：不违时，不厉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蒐秋弥。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

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喜，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时合教，以为民纪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先王之治，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诸侯悦怀，海外来服，狱弭兵寝，圣德之治也。

（《司马法·上卷·仁本篇》）

【译文大意】古时候，人们以仁爱为根本，用合乎情理的办法来治理天下，正常的方法行不通，就该使用变常特殊的手段，特殊手段若必须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就要遵守下列几个原则：杀违法乱纪之人，以使好人得到安全，那么杀是应该的；攻打邻国是为拯救其百姓，那么攻打是对的；用战争手段去制止已发生或未发生的战争，即以毒攻毒，也是应该的。若能如此，仁爱便为人所亲近；有理的行为便为人所悦服；智谋便为人所仰仗；勇力便为人所取法；信用便为人所信任。这样，得到境内百姓的爱戴，可以守固；得到境外百姓的威服，当然可以对外作战了。作战的道理：不要违反农时，不要使百姓经历苦难，以此表示对本国百姓之爱。不趁敌丧乱，不乘敌灾难，以表示对敌国百姓之爱。天寒地冻，酷暑炎热之时，不兴兵动众，以此表示对敌我百姓之爱。所以，国虽大，不得好战，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定，仍不得忘战，忘战必危。天下平定之时，国君已令大奏成功之凯歌，然而武备仍需按期演练，春秋两季国君以围猎形式举行操演大阅，诸侯依命参加，春归务农，秋末组军复出随征，以此备战。

古时作战，战阵追击不过百步，战场逐敌不过九十里，以此表示军队的节制；不穷人力，不强人所不能，哀怜救助伤病之人，以此显示仁爱精神；待敌成列而战，给敌方公平作战机会，以此表示作战信用；争大义而不争小利，以此显示无私的正义感；敌若降服即可免罪，以宽厚待人，以此表示宽大与仁道。能审知后果，察知始因，以此表示深远的智慧。以一上述六种德行而行事，为古代所传的政治道。

先代帝王治理国家，首先顺乎天道，合乎地宜，以有德之人为官，正官名、理万机，分封诸侯，以治界内之民。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尊卑，并以职位定其禄秩。如此，诸侯对天子自然悦服怀德，远在海外诸邦亦会前来致敬修好，讼止狱空，军队备而不用，这就是圣德天子的治世呀。

【阐释】这里的“仁”为根本，重点阐释了几个问题。

其一，战争的目的与性质。我国古时候的政治家与军事家，对战争的性质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吕氏春秋》说：“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亦不可。”这段话的“义”，基本上把战争分为了正义与非正义两大类。正义战争的特点是：平天下之乱，除万民之害，诛暴扶弱。而非正义战争是为了扩大疆土，夺取财物，恃本国之大而凌辱小国之民的。所以，为安人而杀人，就可以杀；为爱其民而攻打其国，就可以攻打，为制止战争而战，发动战争也是可行的。

其二，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在治理国家、解决国内外各种矛盾，用正常方法“政治”行不通时，就必须使用“战争”这种特殊手段。战争的胜败取决于政治，谁有进步的政治和正确的方针，谁就能获得战争的胜利。应该说，政治、军事是相互服务，又相互制约的。

其三，战争与民众的关系：古人已懂得保护人民利益是赢得战争胜利的根本。在春耕秋收之季，尽量不要扰民作战，酷暑严寒之时，也要避免兴兵动众。不但要照顾本国百姓，还要对敌国百姓施以仁爱。这样才能得到敌我双方民众的拥护。“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若能

得到百姓的支持，胜利就有了保证。

其四，要长期备战。无论是凯旋之际，还是平安之时，全国上下都要随时对准备应战，每年的军事演习是必不可少的。“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是一条真理。

严刑峻法诸葛亮治蜀

【原文】诸葛亮佐备治蜀，颇尚严峻，人多怨叹者。法正谓亮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上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敝，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

（《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汉纪五十九）

【译文大意】诸葛亮辅佐刘备治理蜀地，很强调严刑峻法，不少人因此产生抱怨情绪。法正对诸葛亮说：“从前汉高祖入函谷关，与人民约法三章，秦地百姓对他感恩戴德。现在您借助权势力量，占据一州地方，刚刚建立国家，还没有施加恩惠，进行安抚，更何况从客人和主人的方面讲，也应该尊重主人，希望您能放宽刑律和禁令，以适应当地人的意愿。”诸葛亮回答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因为不施德政，政令苛刻，人民怨恨，所以一介草民振臂一呼，秦的统治就土崩瓦解了。高祖在这种情况下，约法三章，才取得很大成功。刘璋糊涂软弱，从其父刘焉时起，刘家对蜀地的人不止有一世的恩惠，全靠典章和礼仪维系上下的关系，互相奉承，德政不能施行，刑罚失去威严。蜀地人因此骄横独断，君臣之间，渐渐失去规矩。给予高官表示恩宠，官位无法再高时，反而被臣下轻视；顺从臣下的要求，施加恩惠，不能满足要求时，臣下就会轻狂怠慢。蜀地所以疲敝破败，实在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引起的。我现在要树立法令的威严，法令被执行时，人们便会感激我们的恩德；以爵位限制官员的地位，加爵的人便会觉得很光荣。荣誉和恩德相辅相成，上下之间有规矩，治国的主要原则，由此清楚地显示出来了。”

【阐释】法律的严厉与宽和，要因时因地而定，否则就会使刑罚无度，国家危机。

魏武帝铲灭佛教

【原文】魏主与崔浩皆信重寇谦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法，每言于魏主，以为佛法虚诞，为世费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讨盖吴，至长安，入佛寺，沙门饮从官酒；从官人其官，见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必与盖吴通谋，欲为乱耳。”命有司按诛合寺沙门，阅其财产，大得酿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万计，又为窟室以匿妇女。浩因说帝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帝从之。寇谦之与浩固争，浩不从。先尽诛长安沙门，焚毁经像，并敕留台下四方，令一用长安法。诏曰：“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尝有此。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九服之内，鞠为丘墟。朕承天绪，欲除为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灭其踪迹。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浮图形象及胡经，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太子晃素好佛法，屡谏不听；乃缓宣诏书，使远近豫闻之，得各为计，沙门多亡匿获免，或收藏经像，唯塔庙在魏境者无复孑遗。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宋纪六）

【译文大意】魏国主同崔浩都很尊重信任寇谦之，也信奉寇谦之的道行。崔浩向来就不喜欢佛教，经常向太武帝进言，认为佛教虚幻荒诞，在世上费财害人，应该把所有的佛教都铲除。太武帝讨伐盖吴后来到长安，进入一座佛庙，和尚们让太武帝的侍从将官们喝酒。太武帝的侍从将官来到和尚们居住的屋里，发现那里有许多兵器，出来禀报太武帝。太武帝大怒说：“这不是和尚们应该使用的东西，他们一定是同盖吴串通，想作乱的。”于是，命令有关部门把全寺院的和尚杀死，查封寺院财产时，又发现酿酒工具及州郡牧守、富人们所寄藏的数以万计的财物；还有用来藏匿妇女的地下密室。崔浩因此劝太武帝将世卜的和尚全部斩尽杀绝，捣毁各种佛经佛像，太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寇谦之极力劝阻崔浩，崔浩不听。太武帝首先斩杀长安的和尚，焚毁佛经佛像，并下诏给留台，让他通令全国，按长安诛杀和尚的法令去做。诏书上说：“从前，后汉君主荒淫无道，信奉迷惑邪道假神以致扰乱天道常规，这是自古以来，九州之中没有发生的事。夸张荒诞的大话，不根据人的常情，在国家将亡时，没有不受到迷惑的。因此，国家政治教化不能推行，礼教忠义大大破坏，普天之下，都变成荒丘废墟。我承上天的旨令，要铲除伪善，保留真实，恢复伏羲、神农时期太子安定的社会，将其他东西全部荡除，消灭它的踪迹。从今以后，胆敢有事奉胡人之神以及造这些泥像、铜像的人，满门抄斩。有不平常的人才能有不太平常的事。不是我，又有谁能消除这历经几代的虚伪东西！有关部门要通告在外征战或驻守的各位将领、刺史，凡有浮图像和佛经等的都必须打毁焚烧，和尚不论年纪大小一律活埋。”太子平素就喜欢佛法，他多次劝谏，但太武帝不听。他于是拖延时间，缓慢地将诏书发下去，使远近寺庙事先得到消息，各自想法脱身，许多和尚都藏了起来，幸免于难，有的把佛经佛像收藏起来。只有佛塔、寺庙在北魏境内不再存在了。

【阐释】魏武帝灭佛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统治，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指控寺庙与叛军有联系，只不过是借口而已。

隋文帝修订律令

【原文】初，周法比于齐律，烦而不要，隋主命高颎、郑译及上柱国杨素、率更令裴政等更加修订。政练习典故，达于从政，乃采魏、晋旧律，下至齐、梁，沿革重轻，取其折衷。时同修者十余人，凡有疑滞，皆取决于政。于是去前梟、轘及鞭法，自非谋叛以上，无收族之罪。始制死刑二，绞、斩；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议、请、减、赎、官当之科以优士大夫。除前世讯囚酷法，考掠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县不为理者，听之次经郡及州；若仍不为理，听诣阙申诉。

冬，十月，戊子，始行新律。诏曰：“夫绞以致毙，斩则殊形，除恶之体，于斯已极。梟首、轘身，义无所取，不益惩肃之理，徒表安忍之怀。鞭之为用，残剥肤体，彻骨侵肌，酷均鬻切。虽云往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梟、轘及鞭，并令去之。贵带砺之书，不当徒罚；广轩冕之荫，旁及诸亲。流役六年，改为五载；刑徒五岁，变从三祀。其余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条目甚多，备于简策。杂格、严科，并宜除削。”自是法制遂定，后世多遵用之。

（《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五陈经九）

【译文大意】当初，北周的法令和北齐相比，条文烦琐而没有要领，于是，隋文帝下令高颎、郑译以及上柱国杨素、率更令裴政等人重新修订。裴政熟悉前代典故，通达统治制度，于是汇集魏、晋旧律，下至南齐、南梁各朝，因循变革，轻重、缓急，取其量刑合适的办法，修订新律。当时参预修订的有十余人，凡有疑难之处，都由裴政裁定。于是废除了前代的梟刑、轘刑及鞭刑。如果不是犯了谋叛以上死罪，不收捕族人连坐。新律所规定的死刑有绞刑和斩刑两种，流刑有三等：从流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有五等，自一年至三年；杖刑有五等，

自六十至一百；笞刑有五等，自十下至五十下。又制订了八议、申请减罪、官品减罪、以铜赎罪、官俭抵罪等款，用以优待士大夫。新律也摈除了审问囚犯使用的酷刑，规定拷打不能超过二百下，连刑具枷杖的大小也都有一定的规定。新律还规定平民百姓如有枉屈县府不受理的，可以依次向郡、州申诉；仍不受理的，可以向朝廷申诉。冬季，十月，戊子，隋朝开始执行新律。隋文帝下诏书说：“绞刑可以致人毙命，斩刑可以使人身首异处，除去作恶的犯人，这样做已经很严厉了。梟首、镬身等极刑，在道义不可取，对惩恶肃纪并没有好处，只表现残忍的心胸罢了。使用鞭刑，摧残囚犯身体，使囚犯骨肌痛彻，其残酷和齧割肌体相同。鞭刑虽在古代就有，但它不是实行仁政的君主所采用的刑法。因此，梟刑、辑刑及鞭刑一同革除。在新法中，尊崇功臣，不对他们用徒刑；优待服冕乘轩的高官显贵及他们的亲属。前代流放六年，改为五年；前代徒刑五年，改为三年。其它以轻代重，代死为生的条款很多，在文本中都有详细记载。杂格、严科，也一起废除。”从此，法律就固定下来，后世多尊用隋律。

【阐释】法律是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工具。刑罚的目的是止恶，惩恶，不是为了泄忿。故梟、磔、轘对死者无恤，使生者恐怖。隋文帝废除之，正显示出他仁德爱民。

唐太宗论文武之道

【原文】春，正月，乙酉，改元。

丁亥，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阵乐，上曰：“朕昔受委专征，民间遂有此曲，虽非文德之雍容，然功业由兹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德彝顿首谢。

(六月)戊申，上与侍臣论周、秦修短，萧瑀对曰：“纣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国无罪，始皇灭之。得天下虽同，人心则异。”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顺教也。”踧跼谢不及。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

【译文大意】春季，正月，乙酉，改年号。

丁亥，太宗大宴群臣，席间演奏《秦王破阵乐》。太宗说：“朕从前曾受命专门征伐隋及各路割据势力，民间于是流传这支曲子。虽然没有文德之乐的文雅而雅，但立国的功业却由此而来，所以始终不敢忘本。”封德彝说：“陛下以神武之力平定天下，岂是文德所能比拟的。”太宗说：“平乱建国应以武力为主，治国守业却应依仗文德，文武的妙用，全在于因时因宜。你说文才比不上武功，这句话说得不对啊！”封德彝磕头道歉。

六月，戊申，太宗与大臣议论周朝、秦朝的政治得失，萧瑀说：“纣王大逆不道，周武王讨伐商朝。周及六国没有罪过，秦始皇吞并他们。取得天下的方式虽然相同，但人心向背则不同。”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周朝取得天下，更加修行仁义；秦朝取得天下，日渐崇尚暴力，这就是长短得失的不同。所以说打天下可以通过抗争，守城则不能不顺应民心。”萧瑀钦服不已。

唐宪宗减免赋税

【原文】五月，庚申，上谓宰相曰：“卿辈屡言淮、浙去岁水旱，近有御史自彼还，言不至为灾，事竟如何？”李绛对曰：“臣按淮南、浙西、浙东奏状，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设法招抚，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岂旨无灾而妄言有灾邪！此盖御史欲为奸谀以悦上意耳，